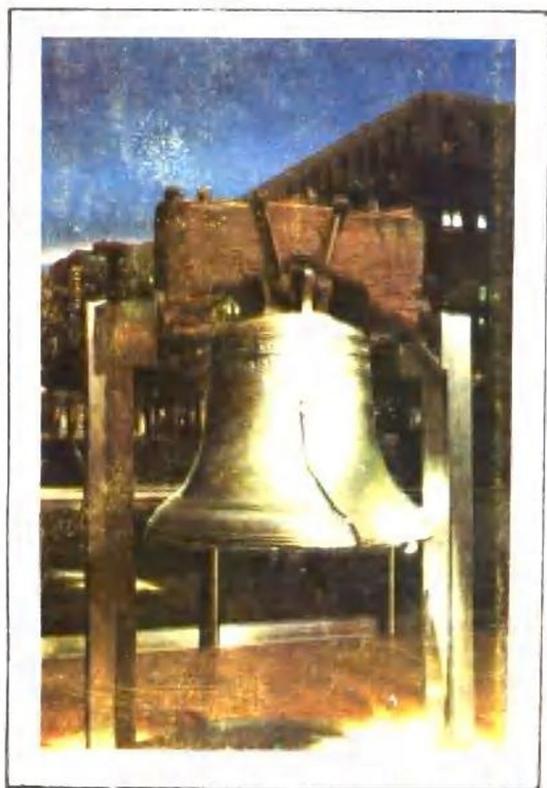


杨玉圣 著



美国 历史 散论

辽宁大学出版社

07

美国历史散论

杨玉圣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C

(辽)新登字第9号

美国历史散论

杨玉圣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地方国营新民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00千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责任编辑: 雪枫 版式设计: 雪枫
封面设计: 牧野 责任校对: 红叶

ISBN 7-5610-2514-9

K·259 定价: 9.80元

喜闻雏凤清声

刘绪贻^①

杨玉圣同志从他近年来所写的文章中选出若干篇，准备出一个集子，约我作序。

通观集子所收的文章，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这包括几个层次。首先，史实应准确。杨玉圣在几篇评论中都指出了所评著作的史实疏漏，同时也肯定了“于细微处见精神”的求实态度。他认为，那种把注重时间、地点等基本史实笼而统之曰乾嘉遗风的作法，“大概也只能说是由于成见加偏见的缘故”。实际上，就史学著作来说，要求史实准确并非“小事”，而是必要条件。不然的话，历史何以能成其为科学？又怎么能进一步总结出真正的历史发展规律呢？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是十分重视的。以中国史学为例，人们不独关心自己著作中史实的准确性，而且还关注前人著述中的缺谬，其中明代朱明镐所撰《史纠》6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要尊重历史。玉圣同志指出，那种“斗”字当头、一斗到底的阶级斗争式的教科书，“人们已经越来越不买账了”。在研究外国历史时，要有尊重外国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态度，应当把历史尽可能地“从平面变成立体、从骨瘦如柴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新形象”。就是说，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再其次，解放思想。这里涉及到

^①刘绪贻 武汉大学教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特约编辑。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本书作者以为，我们搞历史研究，“当然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过，这断非仅是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庸俗作法”，也不是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来取代尚需认真开展的具体研究工作。我由此想起恩格斯说过的这样一段名言：为了了解人类的历史，“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相反的，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1页）。由此我还想到我国的优秀史学传统。拿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来说，这是一部巨著，但对其缺谬，历来都有人不惮匡正。单传之以世的，就有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林伯桐的《史记蠹测》及近人崔适的《史记探源》等。东汉的王充甚至在《论衡》中写下了《问孔》、《刺孟》两文。看来，为了追求真理、把“神”还原为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得做。

第二，探索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一般说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世界史研究曾先后较多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及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来独立地开展研究。在讨论美国史研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时，杨玉圣着重指出了三个方面，即“构筑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科学体系，展现中国人缜密而独到的美国历史观”；“重视中国人的美国史著译成果，尽可能地介绍和吸收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见解”；“中美关系的过去与现在应得到充分的关心和足够的反映”。总的说来，这都是正确的。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原则，应照顾到客观实际。比如，我们真正有特色的著作还不是很多，除老左派外，对美国的史学著作也不是很熟悉，这就要求我们介绍和引述有关著译成果时采取慎重的态度。关于中美关系史，这些年来成果很多，象丁名楠研究员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

书》。不过，就美国史著作来说，不一定每本书都去大谈中美关系史。比如，涉及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以前（甚至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美国史，就不容易多谈中美关系史。即使讲这以后的美国史的著作，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中美关系史的份量。不然的话，就难免不协调。

第三，敢于褒贬。这是提高史学评论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恰好在这一方面目前存在着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以褒而论，往往流于过份吹捧。至于贬，一般不敢问津，或者轻描淡写，难以认真。可是，杨玉圣却不止一次地闯了“禁区”。作为涉足史坛不久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他抱着维护史学尊严、促进史学发展的良好愿望，撇开个人得失，仗义执言，公开批评不正常的风气以及不严肃的学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读他的这类书评，我往往不禁想起幼时在《春秋左传》里读到的“崔杼弑其君”的故事：当崔杼把记其弑君的那位史官杀了以后，后者的两个弟弟继承兄志，亦遭杀害，直到第三个弟弟才把这件事记在简册上；还有一位南史氏，听说大史尽死，也执简以往，后得知此事已载于简册，始作罢。我常常想，这不正是我们中国史学的好传统吗？虽说今天不会有崔杼那样的霸道官僚了，但当初史学家吴晗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也实在是令人寒心的。这就难怪人们在十年“浩劫”之后宁愿明哲保身。如此看来，难道玉圣同志的胆识与正气不应加以爱护吗？

当然，杨玉圣的文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以他的评论为例，有些遣词用字还可斟酌，有的评价似乎还值得商榷。比如，在《评〈二十世纪美国史〉》中，他赞扬该书认为威尔逊的“新自由”“在当时有一定进步作用。它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的论点。其实，这一论点恐怕是不应赞扬的。研究威尔逊的美国权威史学家阿瑟·林克等说，威尔逊1912年竞选总统时，曾“保证恢复竞争赖以活跃的各种条件，借以摧毁垄断资

本并解放企业主的潜力。为达此目的，他特别要求实行关税改革，使信用摆脱华尔街控制，并加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取缔不公平的贸易活动和解散连锁董事会。威尔逊称这种纲领为‘新自由’”（参见《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译本上册第139页）。美国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旧秩序的危机》中指出，威尔逊在1912年竞选时，号召其同胞把美国从巨大财富的虐政之下解放出来。“他说，‘当我们采取措施将有必要克服和摧毁这种影响深远的垄断制度时，我们是在挽救美国的企业而非伤害它；当我们将各企业相互分开、并拆散这些垄断组织时，我们心里想的是……，社会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得到更新的。’这就是‘新自由’”（见该书英文版第27—28页）。由此来看，“新自由”是不大可能促进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威尔逊执政后，据阿瑟·林克和小施莱辛格研究，由于时势的需要和逼迫，他逐渐放弃了摧毁垄断制度的“新自由”政策，采取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由国家管理垄断企业的“新国家主义”政策。就是说，它实际是以“新自由”为名、以“新国家主义”为实的政策。这是促进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政策，怎么能说“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呢？再如，对《二十世纪美国史》认为里根“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动了手术”、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同样重要的转折意义”这种说法，玉圣同志在书评中似乎也是首肯的。可是，这种说法本身还值得研究。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多谈。大体而言，如果说里根政府“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动了手术”，也是一种旧手术，但罗斯福动的是新手术。因为“新政”虽有所继承，但就总体而言，它是新的；里根的内政政策不过是在“新政”遗产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过去共和党政府的旧政策，其中比较见效的减税政策和以国防名义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不管里根加上什么新标签，都是以往的美国政府实施过的，或者说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从理论上说，罗斯福新政的

理论基础与当时崭新的凯恩斯主义类似，以供应学派理论和货币主义为核心的所谓里根经济学（如果有的话），无非是从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那里拾来的（参见刘涤源等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第12章、14章）。过去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失灵，所以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现在倒退回去，岂能言新？以实效而论，罗斯福新政能迅速、全面、大规模地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里根的政策充其量只能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圈子里打转转，并无新的突破。因此，我们似乎难以承认里根的内政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同等重要的转折意义。”

清人章实斋云：良史除才、学、识外，还需有德。杨玉圣同志走上工作岗位不过5载，即已朝此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真不容易。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其评论“都是用心、认真写出来的”。所以，我把这篇序文名之曰：喜闻雏凤清声。

1993年11月15日

于珞珈山

《美国历史散论》序

黄安年^①

杨玉圣同志是80年代中期以来活跃在美国史、中国美国学等领域的青年学者。这本《美国历史散论》，是他从已经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中选辑而成的。客观地说，在当今我国的美国史学界能在而立之年即出版个人论集的，这还是第一次。

杨玉圣在读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时，曾受过良好的历史学基本功训练和优良学风的熏陶，对美国问题研究有着特别的兴趣。还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发表过习作。我在讲授美国近代史课程时，即曾向学生郑重推荐他1986年初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关于“宅地法”开始实施的时间》，提到他能发现人们未能注意而又很基本的史实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收集的文章，反映了他的这一严谨学风。《代役租初探》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当初我有幸参加、主持了他的论文答辩。他的有关美国近代史的多篇文章，都有一定的学术功底和独到见解。除美国近代史外，他的研究兴趣还涉及世界近代史等领域。

本书的相当一部分文章，论及中国美国学的建设和评论。这一领域是我国美国问题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亟待加强。杨玉圣在这一方面富有开拓精神的见解和实践，是值得推重的。我国的美国问题研究自19世纪40年代前后迄今，已历时一个半世纪以

^①黄安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特约编辑。

上，几乎是和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同步的。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美国问题中文著作已有一万种左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15 年来，发展尤为显著。至于美国问题方面的文章，90 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已突破千篇。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比如，美国有影响的《美国历史杂志》已开始选登中国学者的论著目录，并着手约请外国学者评论中国学者的著作。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80 年代末在美国出版了多卷本的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史研究状况的大型工具书，其中对 1945—1980 年中国美国问题研究的评介并不是由熟悉国情的大陆学者撰写的。1991 年，台湾学者和美国学者合著《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分别在台湾、美国印行中、英文版，但书中所述现况及分析，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目前，国内尚无中国美国学这门课程。加强中国美国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学科建设任务。这不仅关系到发展和繁荣中国的美国研究，而且也与中美学术、文化交流不无关系。我个人认为，开展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当前应重视和强调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制订宏观规划，协调学术、出版力量，发挥优势，填补空白；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百家争鸣，加强评论，推动健康发展；第三，鼓励跨学科研究；第四，组织美国问题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开展对中国美国学的研究；第五，促进中国美国问题研究信息手段现代化的进程，尽快研制我国的美国学电脑光盘。有鉴于此，笔者特别赞赏杨玉圣在美国问题工具书和书评方面所作出的可贵努力和可观成果。

重视目录学是我国的优秀史学传统之一，大凡著名史家无不对目录学给予高度重视。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学术事业离开目录学的建设是不可想像的。目前我国和发达国家利用电脑联网来推动目录学的现代化相比还有极大的差距，此类工作所花费的精力和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像的。杨玉圣和胡玉坤合编的《中国

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就是全凭手工收录、汇集整理的。诚如他们在《编后记》中所说:“编纂索引类工具书,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耐心、细心、决心,正是最不可或缺的关键所在。抄录、编排、核对,不言而喻,是极其乏味的。我们始终坚持下来,而且心甘情愿,陶醉其中。事实上,读书、教书、为学,一般而言,何尝能离开工具书呢?”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在编撰《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的过程中也有切身感受,特别是“近年来,图书出版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之风甚烈,一部印量不多的有实用价值的书目检索工具书要想得到出版谈何容易?笔者深感出版之苦绝不亚于编书之辛,著书难,出书更不易。编者不得已集辑校、出版、经销、发行诸务于一身,个中酸甜苦辣难以言表”(详见《〈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编后记》)。杨玉圣同志还算是幸运者,有辽宁大学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并破例获得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而有的工具书的出版或者得不到支持而作罢,或者令编者备尝苦果、厄运,诚可浩叹!其实,“新知识的产生和对已有知识的整理都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杨生茂教授早就说过,编辑书目、索引类工具书“实为裨益于莘莘学子的业绩。”“书目是为科研服务的基本工具之一。书海浩瀚,探索费难。读者若手执书目,库中宝藏尽收眼底,确为一大快事”(见《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美国史(英文)目录》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王梓坤教授也在为《北京师范大学美国问题英文书目》所写的序言中说:研究一门学问,“要涉猎本学科的一些重要文献,特别是近期的文献,以便了解每个领域的基本文章,每篇文章中有什么新成果、新观点和新方法,还有哪些未解决的问题等等。这样,我们便可以从中吸取经验,以最新成就为基点,开始新的探索和研究”。我认为,要缩短我国美国史和美国研究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关键之一是切实重视、关心、扶植和加强

对美国问题工具书的编撰、出版，发挥资源共建共享的作用。想来，对此持公开反对意见者不会很多，但真正身体力行却远非易事。杨君执着于此，辛勤耕耘，殊为难得。

在国外，书评已成为发展和繁荣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以《美国历史杂志》为例，每期发表的书评都在150篇左右。在我国，书评工作并没有得到史学界及国际问题研究界应有的重视。热心书评的学者并不多。书评被认为是“得罪人”的工作，甚至不被看作是学术论文，不被视为衡量学术水准的依据。在发表的书评中，真正有质量的还不很多，有的评论则多溢美之词，个别的几乎失真，达不到真正发展和繁荣学术的目的。杨玉圣的一部分文章是书评，他力图在较高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实事求是，既好处说好，也不讳缺失。围绕《沉重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曾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美国史研究界引起了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对学术领域中某些严重不良倾向作了曝光性的批评式评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以愚之见，只要是与人为善，持之以故，就可以明辨是非，端正学风，从而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与玉圣自通信到结识，至今已逾十度春秋。他1988年到师大执教以来，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看到他的文章的结集，我十分高兴。写了上面的话，愿与玉圣共勉。

1994年1月
于北京

《美国历史散论》出版纪言

刘雪枫^①

我已尽我所能，所以我激动不已。《美国历史散论》就要和读者见面了。做为责任编辑，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公诸于众，这对于我是破例的第一次。

这部出自青年学者杨玉圣之手的富有个性的集子，选自他1986—1994年陆续刊布的论文、评论，是他多年来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学术成果的选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曾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书中既有对晚清以来我国美国史、美国学研究历程的综合考察与反思，也有对美国历史本身重大问题的重新研究和讨论。据我所知，《美国历史散论》是我国大陆学术界迄今仅有的三部个人美国史论文集之一，也是我国青年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个人美国史论文集。

书名曰“散论”，其实论而不散（玉圣一向谦虚）。它有两个核心，一是美国史，一是中国美国学史。关于前者，作者笔触所及，自殖民地时期一直到美国当代史，纵贯古今，其中有对美国历史进程的总体认识，也有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拓荒性探索，他提出的不少观点为圈内人所看重，像他反复强调的要如实地研究美国、从历史和环境的脉络中全面地把握和评价美国、尊重历史和实践、尊重美国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等等。他较早注意到并最早专文论证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这一命题，最早专文倡

^①刘雪枫 辽宁大学出版社编辑。

导美国史的考实性研究。他对于代役租问题、美国内战前关税问题等方面的专题研究，都是国人在这些领域的开创性探索。中国美国学史是近年来玉圣用功最勤的领域之一。除了编撰《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以外，他还在不同场合呼吁要重视和加强对这一新课题的研究，他在这一方面的辛勤耕耘与收获，已受到不少学界前辈及有心人的关注。收在本书中的关于中国美国学史的一组文章，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自成一体。我期望并相信，当玉圣与友人合作的《中国美国学著作提要》、《中国美国学百科全书》问世之际，也就是中国的美国研究真正进入一个新境界之时。

除了论文、札记以外，《散论》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图书评论，看得出来，作者对书评是情有独钟的。书评在新闻出版界有着很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在史学界并不被看重，不少人似乎对书评尚存有一些误会，好像写书评不是在做学问。事实上，写出好书评难度很大。按我的看法，真正能胜任书评的人，必须有相当的思维敏感、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力，同时还须有公正无私、与人为善的气度，德、才、学、识兼备，谈何容易！现在的许多书评之所以写得不地道、看着不舒服，正在于缺乏这些品质。玉圣具备了这些品质，所以他的书评独树一帜，不仅能够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还要褒贬有度，不失和平，借用刘绪贻先生的话说，真不失为“雏凤清声”，令人神清气爽。他的书评，“力图在较高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黄安年先生语），不卑不亢，不落俗套。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被大家所理解、承认，并不是很轻易的事。凭了自己的认真、努力和苦干，玉圣终于赢得了真学实绩，多么令人欣慰。即便是因为书评得罪过某些人，也值。因为，为了学术环境的净化、学术风气的匡正，总得有人敢于站出来，总得有人敢于说出来，江湖公道，总得有人主持。在人际关系照样错综复杂的学术界，能做到这一步，真是很难很难，本书

作者在“后记”中所提到的对书评的忧思，并非无病呻吟。每一个关心书评、史学事业乃至学术和文化建设的人，都应该认真考虑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和呼唤像杨玉圣这样的真正的书评作者。

玉圣称我为友人。我们相识在九年前的秋天，我重返北大作研究生，他从济南同时考来。同窗三年，同宿舍一年，虽说关系清淡如水，但毕业分手之时却显得弥足珍贵。他的身上有许多我们许多人都缺乏的品格。我与他谈不上脾气相投，各自趣味也大相径庭，但如果对他的所作所为的倾慕和喝采也算是志同道合的话，那么我愿意有更多的像玉圣这样的“友人”、“同志”。这许多年来，他是一如既往地满怀责任心在为中国学术界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实事，而且确系不计个人得失……。

我曾为他那部受人称道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助产”，现在又为他的《美国历史散论》“接生”，如果有机会，我还要为他做更多的事。能够为他的劳作与心血的结晶问世忙作，心里真是踏实。

是为出版纪言。

一九九四年初春
于沈阳

目 录

| | |
|--------------|----------|
| 喜闻雏凤清声 | 刘绪贻 (1) |
| 《美国历史散论》序 | 黄安年 (6) |
| 《美国历史散论》出版纪言 | 刘雪枫 (10) |

| | |
|-------------------------|-------|
| 从《美国史纲》谈我国的美国史研究 | (1) |
| 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刍议 | (14) |
| 美国史若干史实辨 | (21) |
| 美国近代史概说 | (24) |
| 沉重的思考 | |
| ——评《移民与近代美国》 | (26) |
| 卡罗来纳殖民地创建史探微 | (44) |
| 代役租初探 | |
| ——美国殖民地时期封建残余研究之一 | (55) |
| 《独立宣言》史事考 | |
| ——兼议美国史考实性研究 | (84) |
| 乔治·华盛顿：一个中国学者的解释 | |
| ——读余志森著《华盛顿评传》 | (97) |
| 一个中国学者的杰斐逊观 | |
| ——谈刘祚昌著《杰斐逊传》 | (102) |
| 论美国内战前关税诸问题 | (113) |
| 关于《宅地法》开始实施的时间 | (126) |
| 中国人的美国宪法观 | |
| ——一个初步考察 | (130) |

| | |
|---------------------------|-------|
| 《美国宪法史稿》读后 | (143) |
| 从洋务热到抵约潮 | |
| ——晚清中国人美国观的一个侧面 | (148) |
| 美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启示 | |
| ——读李剑鸣著《大转折的年代》..... | (162) |
| 边疆、区域与社会变迁 | |
| ——读《美国边疆史》随笔 | (166) |
| 关于《美国史纲》的评论问题 | (175) |
| 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 | |
| ——读邓蜀生著《美国与移民》..... | (186) |
| 大洋彼岸的启迪及其他 | |
| ——评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 | (194) |
| 对美国外交演进轨迹的寻绎 | |
| ——读李庆余著《美国外交》..... | (197) |
| 评《二十世纪美国史》 | (202) |
| 大洋彼岸改革潮的东方效应 | |
|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论界与罗斯福新政 .. | (214) |
| 《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评介 | (247) |
| 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 | |
| ——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 (252) |
| 我国对美国史重大问题的讨论 (1949—1989) | |
| | (261) |
| 开展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 | |
| ——几点初步想法 | (278) |
| 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 | |
| ——回顾与思考 | (281) |
| 中国美国学史：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 |
| ——兼评李本京先生等的新著 | (292) |